

災後集體創傷復元 ——運用跨專業合作增強社區復原力

鐘玉觀、白倩如

壹、前言

人類社會面臨越趨頻繁的自然災難、人為事故和意外災害。在本文撰寫的同時，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俄烏戰爭仍在持續，而韓國萬聖節梨泰院的踩踏事件、巴基斯坦暴雨洪災、土耳其地震、美國感恩節槍擊等重大事件，其所帶來的傷亡、可見與不可見的破壞性傷害，可能需要數年甚至十數年的時間才能修復。如何有效應對各種自然的與人為的災難事件，成為當前全球政府與助人專業體系都亟需發展的重要職能。臺灣自九二一大地震後，又歷經了八八水災致小林村滅村、八仙樂園派對粉塵爆炸、美濃地震致臺南維冠大樓倒塌、高雄城中城大樓大火、花蓮太魯閣號出軌事件等各項重大天災人禍，不但型態多元，且不少有複合性災害（compound disaster）之特徵（註1）。2022年11月10日衛生福利部召開全國災害

防救聯繫兩天會議，召集各中央部會、22個縣市政府及民間協力專業救災團體，以期能因應多樣複合災害類型，強化災害防救之能力，增進各社政災防單位、民間單位之合作與聯繫（鄭鈞云，2022）。

其實，不論是自然或人為災難，均是指會導致生命直接受到威脅、身體傷害、喪親、失落之破壞性事件；除了有形財產與財務等生活資源損失外，對個體社會關係與社會支持的強制剝奪，亦會引發心理健康破壞性影響，包括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身體健康問題、飲食或睡眠障礙、憂鬱焦慮情緒障礙等（林耀盛、吳英璋，2004；Norris et al., 2002）。值得注意的是，長期以來，有關之災害重建政策討論仍少將心理工作者納入，也甚少注意災難對個人心理健康與社會關係長期性的影響。助人專業社群在探討災後重建工作時，大多僅關注個人創傷（individual trauma），

主要思維是將「社會資源連結」與「社會心理恢復」視為兩項獨立的工作範疇，甚至認為只要資源到位，協助危機度過，就算是「完成救災」。然而，此種觀點不僅是忽略災難事件帶來的「集體創傷」（collective trauma）及其深遠影響，也忽略個人創傷症狀、財務災損、社區生活破壞之間的關連性（王美懿等人，2014；李宗義、林宗弘，2013；許文耀，2003；Saul, 2022）。換言之，災後社區重建不僅是家園的修復，更是社會關係與生活意義的重塑與積極復元歷程。因此，本文首先從人與環境的不可分割性來探討災後個體創傷與集體創傷之反應與社會心理需求，接著說明社區復原力之意涵與保護因子，並提出透過跨專業合作，以促進災後集體創傷復元之可能作法。

貳、人與生活環境的不可分割性：災後集體創傷之復元

災難往往是在無預警的情況下，突然侵襲原有的生活，造成個人生命財產重大損傷，以及社會原有或部分的功能受到衝擊。自然災害經常衍生出慢性的壓力情境，例如，遷居、失業等等，使得受波及的民眾持續處於逆境經驗之中。災難可說是高強度的壓力事件，不僅破壞原來的生活模式和生活環境，亦會造成創傷後壓力反應。過去有大量研究關注災難事

件造成的個體創傷反應，諸如吳英璋與許文耀（2004）長期觀察九二一大地震後，個體會經歷持續的心理困境與調適因應歷程，因個人特質與資源變化不同而不同；有些人會無法做出日常壓力反應，立即引發恐懼、害怕、無助等心理上的情緒反射，以及心跳加快、嘔吐、昏倒等生理反應；有些人則是在白天或睡夢中「驚」驗重現（intrusion），或是容易因微小刺激而驚慌失措、對外在刺激反應過敏（hyperarousal）；亦可能出現麻木、否認等壓抑性反應（restraint），以及出現不安、無助、憤怒、傷心等複雜情緒混合性出現。簡言之，災害社會心理重建是由個人創傷觀點主導，將災後社會重建與心理重建獨立為兩個系統，其實這是忽略了災難事件對人與生活環境的雙重破壞具有交互作用之影響。

從生態系統觀點來看，個人與生活環境系統間的關係是互賴且交互影響的（鄭麗珍，2021）。當重大災難導致資源流失的循環快速且顯著時，個人會動員社會支持，進行一連串的獲取、保存、保護自己資源的反應，以降低資源流失的威脅性（Hobfoll, 1998）。故災難事件是否帶來不適應結果，端賴個人外在資源的動員情形而定。當個人感覺有較多情境掌握性（situational mastery），愈會採用積極因應，以減緩所受的影響（Aldwin et al., 1996）。Altman（1975）則指出，人類會對其領地（territory）邊界和權屬進行隱

私管理與維護，口頭語言、手勢、空間環境行為或文化行為都是領地行為的一種表現。社區中人們花最多時間待在其中的生活中心為「主要領地」，使用時間不長，但會規律使用的為「次級領地」，舉凡教會、圖書館、寺廟、社區活動中心等，都是居民日常的生活空間。當人們習以為常的中介系統（*mesosystem*）及其社會性基礎設施（*social infrastructure*）遭到破壞時，人們日常生活弱連結（*weak ties*）即受到強制剝奪（克林柏格，2018／2021；Saul, 2022）。此種社會關係破壞正是集體創傷所關注之焦點。集體創傷是指重大災害事件：

對社會生活最基本組成單位的破壞，包括破壞人們依附連結的社會連帶（*social bonds*），同時削弱原有存在的社區意識。（Erikson, 1976, p. 154; 引自 Saul, 2022, p. 5）

也就是說，災難事件會對個人社會生活帶來長期社會網絡破壞，以及共享的社會情感（*shared sentiments*）和信心之崩潰（Fullilove, 2013）。

集體創傷也可能來自那些應對事故負責的人並未道歉、否認責任，或在沒有任何愧疚的情況下從受害者身邊撤退，抑或是未受到相應的司法審判，這些都將使人感到被原先信任的社會體系背叛、貶低和羞辱，感覺過去建立的社區互信和體面蕩然無存（Erikson, 1976, p. 154; 引自 Saul, 2022, p. 6）。因此，從集體創傷

的觀點來看，災後重建並不僅止於危機的度過和有形家園的建設，如何使倖存者及其重要關係人的社會生活環境、社會支持網絡、社會信任等均能獲得復元（*recovery*）（註2），才是應追求的積極目標。尤為關鍵的是，災後集體創傷之復元有賴重建個體支持性、滋養性與公平正義的社會環境。當個體所遭受之災害能夠被賦予積極性意義、受到公平正義的問責（*accountability*），以及使個體重新與生活社區產生連結，在滋養性與支持性的環境中進行身心治療，方能超越事件本身的苦難和重獲希望感。

由於大型災難往往造成社會網絡、關係、功能、動力、資本、資源等社會結構的持久性傷害，故而這些集體層次的負向後果之衝擊與撕裂可能導致社會性質的改變（Somasundaram, 2014）。因此，災後介入要結合社區回應性方法，同時關注資源、能力與社會關係連結的增加，啟動社區原有的復原力來促進對災難受創的療癒（Auerswald, 1983; Landau & Saul, 2004; Masten et al., 2021）。簡言之，集體創傷是身體、心理、社會、文化、生態等多層次的傷害，破壞了將人們聯繫在一起的社會紐帶，衝擊到人際關係、家庭、社區、社會等關係，進而削弱了社區意識、社會信任與安全感（Saul, 2022）。修復家園、房屋與公共建設固然是災後重建重要的一環，但災害破壞人們最隱私的生活空

間與安全感，故而社區居民生活棲息地、中介系統公共空間、社群歸屬感之重建亦不容忽視（許文耀、曾幼涵，2003）。值得注意的是，在斯里蘭卡的Tamil村莊的集體文化社會（註3）中，集體創傷事件會破壞個人身分認同來源，使整個社區普遍陷入絕望、消極和沉默中，同時喪失價值觀和道德規範，而必須通過綜合多層級系統的救濟、治療與發展計畫，方能獲得有效解決（Somasundaram, 2007）。Landau與Saul（2004）亦認為，多層級系統取向（multi-systematic approaches）對促進家庭與社區復原力有積極之作用。

由於人與環境的不可分割性，在災後重建工作上，應同時納入社會工作與社區心理衛生工作，透過提供資源、重建社區環境、增進社會資源與社會支持，促使個人能逐步重拾生活控制感、自我效能、希望感與意義感。此種工作取向是以建構社區復原力（community resilience）作為理論基礎；透過社區復原力保護因子的發展，讓人類及所生活的社區能夠更具有對抗風險環境的韌力，以促成集體創傷復元之積極目標。

參、社區復原力之意涵與保護因子

一、社區復原力之意涵

復原力是指人類在面對重大災難與創

傷時，系統的生存功能即便遭遇威脅與發展逆境，亦能透過生物性、心理性、社會性與靈性資源等多重系統加以因應。復原力的概念最初側重於幫助個人克服困境的個人內在層次的特質，隨著多年研究的累積和演變，逐漸轉向採用以生態觀點來建構，關注更大的環境因素如何塑造與影響個人功能（王智弘等人，2017；白倩如等人，2014；Greene, 2014；Ungar, 2011）。近年來，社區復原力已成為對抗風險社會的重要理論觀點；這使得助人專業領域開始超越個人層次創傷處遇，從原本以醫療模式為基礎的工作焦點，移轉到從社區層面促進災後的復原與重建。事實上，社區是理解個體健康與適應的重要評估單位，人與其生活的社區是分不開的。Mayunga（2007）指出，有復原力的社會系統在面對災難事件時，能連結個人行為及社區能力，緩衝災難的衝擊、進行重建並恢復系統的運作。

最初，社區復原力是指社區承受重大創傷、失落事件時，能成功克服逆境之總體能力、希望與信念（Auerswald, 1983）。其後，Kirmayer等人（2009）對社區復原力之兩類概念內涵進行重要的區分；其一指個人復原力如何受到社區中的社會網絡、文化資源的影響而有不同，其二則是指集體社會資本或社區內在壓力回應之總體能力；而後者涉及社區內各個子系統（即個人、家庭、團體、組織、

社區等)的調整和適應,以及整個社區系統與其鉅視環境體系(包括社會、經濟、政治實體)的交互作用。Kirmayer等人(2009)進一步歸納出社區應對災難事件復原力是三項能力的總和:(一)對抗力(resistance),是指透過調整和適應來抵銷災難事件的挑戰;(二)恢復力(recovery),是指當災難或挑戰事件獲得解決後,社區恢復到過去狀態之能力;(三)創造力(creativity),是指社區通過創建新的制度和作法來發揚其核心價值信念,並從而發展出新的運作方式和方向。因此,社區復原力可說是群體得以獲取多層次的資源,面對逆境時仍可以維持良好運作的能力;亦可說是社區展現支持與資源,使社區群眾得以順利面臨生活波動與壓力的歷程。研究顯示,在災難發生後幾周或幾個月內,幾乎都會對個人與家庭造成不同程度的痛苦,僅少數人或社區會被判定達到疾病程度或是長期受損的情況;通常當壓力源已減輕,或是已有足夠的資源協助,多半可以恢復災難前的功能水平,而產生適應結果的過程即是復原力之作用;而復原力愈好,恢復事件前功能的速度愈快(Norris et al., 2008)。

二、社區復原力之保護因子

保護因子是指能減緩、調節或修補風險,並能預測未來正向發展結果之要素(Rutter, 1987)。過去以病理觀點提

供服務是偏向處理風險因子,較少關注如何擴增能夠對抗生活逆境之保護因子(白倩如、曾華源,2022)。Norris等人(2008)認為社區群體健康(population wellness)是社區復原力的效果指標之一,亦即人們擁有良好的心理健康、行為健康、角色功能及生活品質。社區復原力從四組適應性能力網絡中產生,包括(一)經濟發展;(二)社會資本;(三)信息和溝通;(四)社區能力等四大層面。若要發展社區集體韌力則須降低風險與經濟不平等、讓當地人參與減災行動、建立組織聯繫、促進社區支持以及對於未知情況有所計畫。Pinderhughes等人(2015)則主張,社區復原力包含「人」、「空間」、「機會」這三種環環相扣的元素,「人」即社會文化環境,代表社會連結與信任、為公眾事務出力的意願、擁有健康的文化常規;「空間」即物理建築環境,像是安全的公共空間、文化表達、安全可用的設施、健康的食品、有品質的住所;「機會」則是經濟職業機會、工資與地區福利、教育機會與品質等。若此三元素能提供健全的功能,則社區復原力便有機會被建立起來,使個體、家庭與社區幸福感增加。綜上所述,機會分配均等性、足夠的教育與工作資源、良好的人際支持與社會連結、可信賴的傳媒資訊等是社區復原力的重要保護因子。此外,面對災後工作機會流失與經濟不穩

定，教育程度與工作技巧等人力資本將影響復原速度，而社會性基礎設施、棲息地連結（attachment to place）等環境之安全與支持性將影響社區凝聚力與認同感。上述保護因子均離不開人、空間、機會三元素的跨層面的交互作用（如圖1）。

李宗義與林宗弘（2013）認為面對災難時每個人的受災風險其實並不相同，即災前種種社會經濟條件，例如，地域、族群、階級與性別不平等，會影響人們面對災難的死傷機率與經濟損失。相對於強調結構面與個人社經條件的脆弱性因子，社區復原力更強調人們在災難之中的社會動機與集體行動能力。因此，社區復原力之災後重建致力於促進人們集體決策、行

動、社會合作與連結的經驗，以達到個體、家庭與社區災後調適與重建生活的效果。潘穆嫻等人（2016）建議，為因應愈趨多元的災害型態與災害規模，臺灣應從目前屬於個別災害管理的災害防救體系，轉而透過人文社會科學的角度去理解如何促進社會、組織、社區、個體的復原力，進而發展適用於臺灣脈絡的災後重建工作。因此，如何啟動人、空間與機會等三元素的交互作用，對於促進社區的復原非常關鍵。多元的災難類型使得人們可能經歷了多層面的失落與複雜的創傷經驗，像是身體重傷、身心完整感受到衝擊，重要關係的逝去、家庭或社區領袖不再，完整的家庭、住宅或社區受到破壞，經歷經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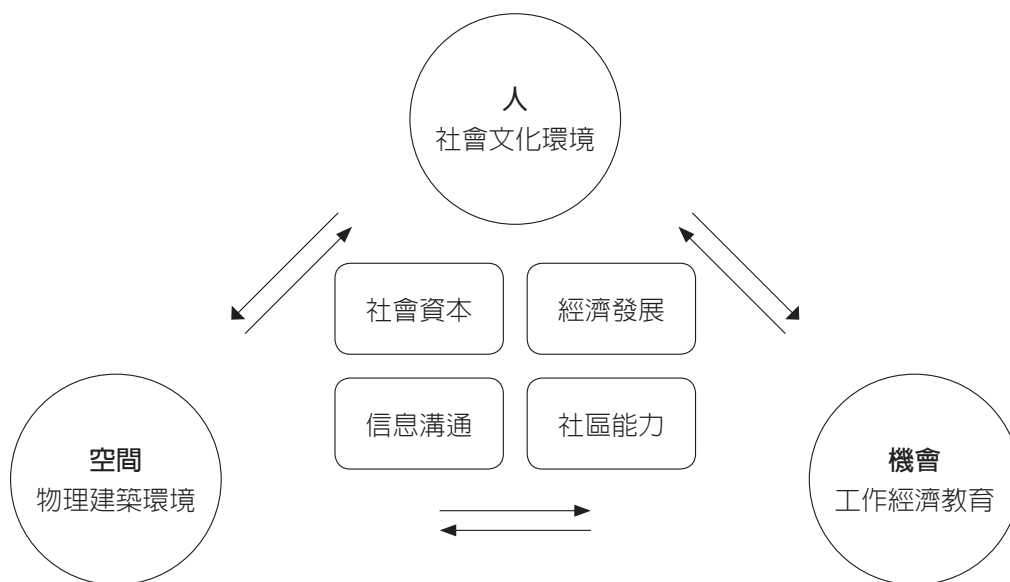


圖 1 人、空間、機會交互作用下之社區復原力之適應能力網絡

資料來源：作者修改自Norris等人（2008, pp.127-150）；Pinderhughes等人（2015）。

生計上的撼動，原有對未來的希望與可能性遭受打擊，對世界不再感到安全等等。是故，若要達到集體創傷的復元，勢必要超越個人層次，走向多重系統取向的介入，包含個人信念系統、社區組織型態、溝通與問題解決能力等系統。

肆、活化社區復原力以促成災後集體創傷復元

整合國外災後社區復原力的研究（Landau & Saul, 2004; Walsh, 2007; Walsh & McGoldrick, 2004）可以發現，有效的處遇不外乎鼓勵個人與社區均需要積極參與，以促進彼此的「分享」與投入「重建」。首先，分享是指全家人或是社區成員聚在一起，說說對創傷事件的認知與想法，互相分享失落感受、倖存下來的經驗與意義感、靈性經驗，共同參與集體療癒儀式等等，過程中諮商輔導與社工人員共同參與，能夠肯認個體或是看見群體在逆境中的堅持、勇氣、相互支持等優勢特質，並透過此歷程達到情緒的紓解、獲得普同感、認知澄清或共同經驗而強化彼此關係性連結與社會支持效果。高晟洋（2019）的研究結果凸顯了「社會資本」的重要，從其416份家訪問卷調查分析中，發現在2014年高雄氣爆事件一年後的災區居民心理適應上，「日常生活變動」與「人際關係變動」能顯著降低創傷

後壓力症狀，減緩對憂鬱與生理健康的負面影響。值得注意的是，動員社區資源進行重建時可能令人形成心理負擔，因此最好透過整個社區的集體行動，讓資源與社區成員彼此作用，較能發揮效果。其次，重建涵蓋了在社會文化層面上建立組織、加強社會支持系統、共享資訊與資源、發展新的關係角色、社區功能、家庭親屬；也包含物理層面，像是公共建築的修復；以及掌握生活節奏、健康的生活常規、未來規劃等，進而個人得以重新投注於關係、擁有生活的追尋目標等動力。王子葳（2013）研究發現傳統由女性負責家務的分工模式將不利於災後心理調適與靈性健康，因此建議助人工作者應提供具備性別與文化敏感的心理支持，在災區提供托育與喘息服務，以減輕女性家務分工與照顧負擔、能夠走出家庭投入社區重建，並協助弱勢經濟者經濟充權。

無論是分享、述說、儀式、組織與資源的重整，關鍵在於人們的參與程度（Coles & Buckle, 2004）；唯有受影響的社區充分參與，並且擁有充足的技能與知識，才會產生效用。此外，讓家庭或社區知道每個人度過創傷的因應方式與決策不同，在過程中能夠尊重個別差異、保持開放與持續願意互助。這些歷程使得家庭與社區系統在過渡壓力階段時，得以將社會結構中被破壞的多個層面重新連結起來。張勝凱（2019）訪談觀察15位集體遷村的

嘉義縣逐鹿社區居民，發現社區居民多數已習慣永久屋內的生活空間與環境，但未產生認同與歸屬感，時常須藉由與山上部落連結來緩解生活壓力。雖然遷村後自主建構了市集空間，但多數居民仍選擇返回原鄉從事農耕，永久屋這個「家」的狀態對於他們來說相當矛盾。後續經由計畫改造，將部落家屋建築、文化、語彙重現，突破了永久屋建築框架的生活動線，重視傳統部落文化在新聚落之存續，這樣的集體行動慢慢讓當地人找回「在家」的味道。這也讓人意識到災後重建不只是硬體建設、經濟發展，更涉及了人的本質，同時也包含文化及環境土地的復元。

過去在處置災後社區的重建工作時，諮商心理專業與社會工作經常是各自處理不同的系統，即便有少數研究（許育光，2015；趙祥和，2014）建議應該採取跨專業合作取向、重視專業人員的分工與整合，但在實務工作上，因為缺乏一致的處置目標與理論基礎，導致跨專業只是在一起工作，而沒有產生真正的合作。其實，社區需要強大的保護機制，以緩衝重大災害帶給社會與群眾的衝擊。因此，在災後協助上，專業人員應有意識的促發保護因子作用的發揮。Norris等人（2008）認為復原力是將資源與結果；亦即適應能力與適應結果連結起來。故專業人員在實務介入時，可在下列幾個目標層面進行干預，使社區中動態屬性的資源連結

起來。要使災後重建工作著力於社區復原力的發展，本文建議可以從以下四個層面，由社會工作與諮商心理專業共同合作進行處置設計。

一、社區能力：促使組織合作連結、增進集體效能

應主動加入社區，對於社區組織、據點與傳播管道多加掌握。諮商心理師與社會工作者可以一起前往社區據點，瞭解社區目前具有的資源與資訊傳送管道、地方信仰，並觀察蒐集當地的文化慣習與共通經驗，以促進社區發揮在地經驗、知識與技能來解決問題或進行決策。參加當地災後社區大會時，可以留意重要的社區集體活動；比如村莊裡關乎公共基礎建設重建的討論，或是社工人員召開組合屋分配的村民大會時，諮商心理專業人員亦共同參與其中，於自然情境脈絡中展開關懷，發現需要進一步協助的對象。趙祥和（2014）研究發現制式化的專業角色易引發拒絕，從外在需求開始服務是相當好的策略，有利轉介至心理服務。此外，透過關係的建立與開啟對話，將能協助會議討論進行得更加順暢，像是發生情緒衝突時能夠化解與緩衝氣氛，引導人們回到共同關注的目標，這亦有助於組織合作、集體效能的提升。Miller-Karas（2023）在其發展復原力一書中提到有實證效用之社區復原力模式，即是透過心理衛生教育，向

倖存者傳授關於創傷壓力反應與復原的神經系統相關生物學知識，以及跟人們分享在創傷壓力反應時，可以如何互助，協助他人平衡神經系統。多數倖存者表達當明瞭創傷後的身心反應、發現可以如何幫助自己與他人、管理自身的焦慮與憂鬱時，都感覺更有控制感，且進一步找到協助「我們社區」度過這一切的有力資源。因此，在社區重要活動與集會裡頭穿插心理衛生教育的宣講，也會很有幫助。

二、社會資本：激發社區居民參與、強化關係連結

災害破壞了社交網絡、組織與關係，Miller與Pescaroli（2018）認為「團體」是達成修補社會連結的絕佳方式，能將人們團結起來，促進合作、產生連結、減少孤獨感、罪惡感等負向情緒。跨專業取向的合作要著重在促進社區層面社會網絡重建。因此，採取團體工作是災後復原的一個重要起點。考量華人文化家庭脈絡中經常以親子軸為核心，專業人員可以與學校或是當地圖書館合作，辦理親職講座與小朋友說故事團體，邀請家長或是爺爺奶奶一起來到學校參加活動。這時諮商活動團隊裡應該由諮商心理師與社工師配搭，心理師擅長身心情緒與認知調節、引導具療癒性的對話及活動，而社工師能夠觀察與蒐集每個家庭的資源需求狀況。學校中可能有師生於災難中罹難，專業人員鼓勵民

眾帶著家人一同參加哀悼或紀念儀式，紀念儀式的地點與進行通常反映著一個地區的文化慣習，參與這些活動將自然而然的與社區或當地之共同情感記憶有所連結。當人們能一齊失落、哀悼與祝福，甚至彼此分享受創經驗時，悲傷就不再是個人不可承受之重。

三、環境制度：改善社區不利條件、促進社區經濟

災難會更加凸顯原本處於邊緣化的弱勢個體與團體所經驗到的不平等與不公義（West-Olatunji & Goodman, 2011）。專業人員須具有社會正義的觀點，知道社會結構中經濟資源的多寡與均等性影響著受災程度與災後適應（鄧傳忠等人，2020）。尤其弱勢族群可能因對政府部門、機構、助人專業感到陌生且不信任，而更加拒絕。因此，主動提供具文化性的回應、與社區民眾發展合作式的夥伴關係，能夠接觸到需協助對象並獲取信任，讓資源能真的來到需要支持之處、達到社區賦權，將是改善社區不利條件的關鍵。須特別留意人們賴以生存的活動或產業受到災難衝擊，不可忽略資源盤點的重要性。有關專責單位進到當地評估社區需要的機會、產業轉型、待改善的公共空間等皆相當重要，方能協調不同單位共同參與，統合社區所需，辦理博覽會、市集、求職技巧講座等；抑或是在社區的宗教中

心、公共基礎設施發放物資的時候，主動邀請當地農民參與農會市集；邀請勞工局職涯中心設攤、媒合當地就業需求與機會；邀請單位辦理親子公園健走活動；亦可與當地各級學校一同合作，帶領學生彩繪老舊社區，走入社區的大街小巷、共同妝點社區新面貌。如此一來，在資源挹注、促進經濟力與勞動力發展的同時，亦避免環境不利導致慢性壓力的延續。更重要的是，啟動了更多的社會參與以及連結。

四、社會建構：從集體敘說中療癒創傷、重構災害復元意義

上述三點皆是在幫助災後受創的地區建立一體感，恢復生活功能以及具涵容、保護、安全的棲息地，重新連結人力及物質。然而，文化與情感認同是把這些結構更穩固黏著在一起的元素。人類社會除了組織、制度、建築等結構層面，還要考量文化、歷史與情感記憶。個人、家庭和社區是透過文化視框解讀其經歷過的事，文化與經驗塑造了對於事件因果關係的不同解釋。因此助人工作者在進行跨專業合作時，務必要注意當地關於健康和疾病的文化觀點，社區通常早有其面對民間疾病的看法與療法。若深入觀察，可以發現每個地區有其方言與常用語，無論在號召人們參與活動、帶領團體或是心理衛教時，都可以善用，以制定適合不同文化社

區的介入措施。過去個別諮商或是個案服務，經常只是一對一的述說，而社區復原力取向，則是強調集體述說以及創傷與反應的肯認。因為受災居民如何敘說災難的發生原因、安全與否的主觀感受、對於應該如何因應的觀察，這些社會觀點與意義感皆出自於當地文化與環境脈絡（Miller & Pescaroli, 2018）。華人的心理與行為運作深受關係主義影響，並且在華人文化中經常出現「禍福相倚」、「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等話語，這些產生於脈絡化性格變項之辯證思維，正是華人文化之特色與優勢所在，影響著華人群眾對於災難事件的敘說與詮釋（王智弘等人，2017）。因此，透過串連事務資源、心理社會與醫療等服務，以當地熟悉的文化慣習與活動，凝聚社區一體感、重建居民們對自身所處團體之認同與記憶（趙祥和，2014）。除了將災後受損的社區建設與資源連結起來，也重新建構了人們對其生活地區的認同、記憶與情感，強化社區體質的健康，才是真正具有社區復原力。

伍、代結語：災後重建中助人專業跨系統協力之必要性

從前述討論可知，重大災難帶來的集體創傷涉及面向廣泛，僅聚焦於內在情緒與個人創傷復原已經不足應付。災後心理重建議題涉及受災者、救難人員的創傷

後壓力症候群，顯然需要國內心理諮商人力共同參與救災。過去諮商心理領域著重災後創傷的評估與處遇，以及失眠、憂鬱等身心症狀的協助，大多從認知與情緒層面進行介入；而在社會工作領域，災後的協助著重在資源分配與輸送方面，諸如組合屋的重建與福利分配等。災後重建要能擴展至更大的系統層面來動員，就要利用個人、家庭與社區資源的豐富性，與社區成員一同工作（Landau & Saul, 2004）。然而，跨系統合作不僅是將不同專業系統成員「集合在一起做事」，而是專業工作典範的轉移（王美懿等人，2014；Saul, 2022）；不同專業間的理論模式觀點也可能存在歧異，而導致合作障礙（王美懿等人，2014；趙祥和，2014）。其次，協力合作（collaboration）至少有七種不同之合作層次，包括：（一）資訊交換，包括非正式的資訊交換或正式的聯繫會議；（二）個案協作，指由某個系統擔任統籌個案多系統服務的協調者；（三）跨單位會議，指不同單位的服務提供者討

論共案；（四）跨領域團隊，指透過跨專業、專業間或跨領域共事等形式，將各自專業帶進團隊中，彌補各自專業缺乏的知識；（五）合夥夥伴（partnership），指基於單位之間正式的共同合作協定，以整合跨單位服務，有對彼此責任與工作分配之協定；（六）空間共置（co-location）；（七）聯合預算（Andersson et al., 2011）。其中，跨領域團隊與合作夥伴的成敗，端視成員間聯繫之緊密度、互賴度而定。此部分仍有待各界共同積極發展政策制度層次的災後重建協力體制，方可能破除系統間的行政壁壘與既定的專業角色框架，避免徒然增加「人多嘴雜」的溝通與行政時間耗損。

（本文作者：鐘玉觀為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博士生、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諮商心理師；白倩如為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副教授）

關鍵詞：社區復原力、集體創傷、跨專業合作

📖 註 釋

註1：複合性災害是指各項災害事件之間彼此鏈結，導致二次災害發生、直接或間接衍生其他次要災害，且會以乘數效果擴及其規模與力度，致使減災、防災、救災與應變之複雜性增加，災害類型可分為時間式複合災、鏈結式複合災害與損害經驗式複合災害（張學聖、廖晉賢，2014）。

註2：依據宋麗玉與施教裕（2009）之界定，復元「並非指恢復原狀或是創傷與障礙消失，而

是指由現在出發，重新找到自己存在的意義，即重新界定自己的人生價值，並能體現主體性，重建具品質且滿意的生活」（頁485）。也就是說，復元並不僅是消極的「恢復原狀」，而是一種從逆境和苦難中找到積極意義的超越狀態。

註3：指個人身分認同是由村莊通過其傳統與制度為日常生活提供基礎與框架构成，當戰爭破壞社會之家庭關係、人際網絡等基本結構時，個人的社會角色失落的破壞性較個人主義文化社會之影響更為深遠。

參考文獻

- 王子葳（2013）。《性別家務分工、家庭決策與災難適應與復原之關係》（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https://hdl.handle.net/11296/rq9fqd>
- 王美懿、林東龍、陸悌（2014）。〈精神醫療團隊於莫拉克颱風災後心理重建之在地實踐經驗：兼論精神社工專業角色的省思〉。《臺大社工學刊》，29，97-148。<https://doi.org/10.6171/ntuswr2014.29.03>
- 王智弘、劉淑慧、孫頌賢、夏允中（2017）。〈文化脈絡中的危機，轉機與復原力：本土諮商心理學研究的方向，目標與策略〉。《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50，1-28。<https://doi.org/10.3966/172851862017120050001>
- 白倩如、李仰慈、曾華源（2014）。《復原力與任務中心社會工作》。洪葉。
- 白倩如、曾華源（2022）。〈我命由我不由天？當代弱勢青少年社會生態復原力保護因子之建構〉。《正向心理：諮商與教育》，1，65-76。[https://doi.org/10.30099/PPCE.202206_\(1\).0006](https://doi.org/10.30099/PPCE.202206_(1).0006)
- 克林柏格（Klinenberg, E.）（2021）。《沒有人是一座孤島：運用「社會性基礎設施」扭轉公民社會的失溫與淡漠》（吳煒聲，譯）。臉譜。（原著出版年：2018）
- 吳英璋、許文耀（2004）。〈災難心理反應及其影響因子之文獻探討〉。《臨床心理學刊》，1（2），85-96。
- 宋麗玉、施教裕（2009）。《優勢觀點——社會工作理論與實務》。洪葉。
- 李宗義、林宗弘（2013）。〈社會韌性與災後重建：汶川地震中的國家與地方社會〉。《東亞研究》，44（2），1-38。[https://doi.org/10.30402/EAS.201307_44\(2\).0001](https://doi.org/10.30402/EAS.201307_44(2).0001)
- 林耀盛、吳英璋（2004）。〈雙重變奏曲：探究「九二一」地震「失親家毀」受創者之心理經驗現象〉。《中華心理衛生學刊》，17（2），1-41。[https://doi.org/10.30074/FJMH.200406_17\(2\).0001](https://doi.org/10.30074/FJMH.200406_17(2).0001)
- 高晟洋（2019）。《探討高雄氣爆災後生活變動與社區資源對居民心理症狀與生活品質的影響》（碩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https://hdl.handle.net/11296/>

at243g

張勝凱（2019）。《集體遷村部落災後重建生活適應問題之探討——以嘉義縣逐鹿社區為例》（碩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https://hdl.handle.net/11296/aax6bg>

aax6bg

張學聖、廖晉賢（2014）。〈複合性災害評估架構研究：莫拉克風災為例〉。《都市與計畫》，41（3），305-327。

許文耀（2003）。〈資源流失、因應、社會支持與九二一大地震災民的心理症狀之關係〉。《中華心理學刊》，45（3），263-277。<https://doi.org/10.6129/CJP.2003.4503.04>

許文耀（2004）。《災後心理反應歷程與心理處置歷程之長期追蹤研究——子計畫：從資源變化歷程及影響因子觀點探討災民心理狀況的變與不變》。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https://www.grb.gov.tw/search/planDetail?id=639140>

許文耀、曾幼涵（2003）。〈九二一大地震後災民的資源變化與心理症狀間的關係〉。《中華心理衛生學刊》，16（2），1-19。[https://doi.org/10.30074/FJMH.200306_16\(2\).0001](https://doi.org/10.30074/FJMH.200306_16(2).0001)

許育光（2015）。〈社區災難現場心理協助團體之領導者訓練模式與團隊合作建構實務初探〉。《輔導季刊》，51（3），29-36。

趙祥和（2014）。〈短期社區諮商介入災難救援場域之初探性研究：以八八水災的心理復健工作為例〉。《教育心理學報》，45（4），517-538。

潘穆嫻、林貝珊、林元祥（2016）。〈韌性研究之回顧與展望〉。《防災科學》，1，53-78。

鄧傳忠、陳淑惠、李香潔（2020）。〈資源適配度對災後心理健康的影響——以莫拉克風災為例〉。《中華心理衛生學刊》，33（1），1-26。[https://doi.org/10.30074/FJMH.202003_33\(1\).0001](https://doi.org/10.30074/FJMH.202003_33(1).0001)

鄭鈞云（2022年11月10日）。〈全國災害防救聯繫會議22縣市齊聚基隆〉。《中華日報》。<https://tw.news.yahoo.com/全國災害防救聯繫會議-22縣市齊聚基隆-120951965.html>

鄭麗珍（2021）。〈生態觀點〉。載於宋麗玉、曾華源、施教裕、鄭麗珍，《社會工作理論：處遇模式與案例分析》（五版；頁277-303）。洪葉。

Aldwin, C. M., Sutton, K. J., & Lachman, M. (1996). The development of coping resources in adulthood. *Journal of Personality*, 64(4), 837-871. <https://doi.org/10.1111/j.1467-6494.1996.tb00946.x>

Altman, I. (1975). *Environment and social behavior: Privacy, personal space, territory, and crowding*. Brooks/Cole.

Andersson, J., Ahgren, B., Axelsson, S. B., Eriksson, A., & Axelsson, R. (2011). Organizational approaches to collaboration in vocational rehabilitation: An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revi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grated Care*, 11(4), 1-10. <https://doi.org/10.5334/ijic.670>

Auerswald, E. H. (1983). The Gouverneur Health Services Program: An experiment in ecosystemic

- community care delivery. *Family Systems Medicine*, 1(3), 5-24. <https://doi.org/10.1037/h0090087>
- Coles, E., & Buckle, P. (2004). Developing community resilience as a foundation for effective disaster recovery.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19(4), 6-15. <https://doi/10.3316/informit.375435145094637>
- Fullilove, M. (2013). *Urban alchemy: Restoring joy in America's sorted-out cities*. New Village.
- Greene, R. R. (2014). Resilience as effective functional capacity: An ecological-stress model. *Journal of Human Behavior in the Social Environment*, 24(8), 937-950. <https://doi.org/10.1080/10911359.2014.921589>
- Hobfoll, S. E. (1998). *Stress, culture, and community: The psychology and philosophy of stress*. Plenum.
- Kirmayer, L. J., Sehdev, M., Whitley, R., Dandeneau, F. S., & Isaac, C. (2009). Community resilience: Models, metaphors and measures. *Journal of Aboriginal Health*, 5(1), 62-117.
- Landau, J., & Saul, J. (2004). Facilitating family and community resilience in response to major disaster. In F. Walsh & M. McGoldrick (Eds.), *Living beyond loss: Death in the family* (pp. 285-309). Norton.
- Masten, A. S., Lucke, C. M., Nelson, K. M., & Stallworthy, I. C. (2021). Resilience in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Multisystem perspectives. *Annual Review of Clinical Psychology*, 17, 521-549.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clinpsy-081219-120307>
- Mayunga, J. S. (2007, July 22-28). *Understanding and applying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disaster resilience: A capital-based approach* [Paper presented]. The summer academy for social vulnerability and resilience building, Munich, Germany. [https://www.theism.org/documents/Mayunga%20\(2007\)%20Understanding%20and%20Applying%20the%20Concept%20of%20Community%20Disaster%20Resilience%20-%20A%20Capital-Based%20Approach.pdf](https://www.theism.org/documents/Mayunga%20(2007)%20Understanding%20and%20Applying%20the%20Concept%20of%20Community%20Disaster%20Resilience%20-%20A%20Capital-Based%20Approach.pdf)
- Miller, J. L., & Pescaroli, G. (2018). Psychosocial capacity building in response to cascading disasters: A culturally informed approa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30, 164-171. <https://doi.org/10.1016/j.ijdr.2018.04.018>
- Miller-Karas, E. (2023). *Building resilience to trauma: The trauma and community resiliency models* (2nd ed.). Routledge.
- Norris, F. H., Friedman, M. J., Watson, P. J., Byrne, C. M., Diaz, E., & Kaniasty, K. (2002). 60,000 disaster victims speak: Part I. an empirical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literature, 1981-2001. *Psychiatry: Interpersonal and Biological Processes*, 65(3), 207-239. <https://doi.org/10.1521/psyc.65.3.207.20173>
- Norris, F. H., Stevens, S. P., Pfefferbaum, B., Wyche, K. F., & Pfefferbaum, R. L. (2008). Community resilience as a metaphor, theory, set of capacities, and strategy for disaster readi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41(1-2), 127-150. <https://doi.org/10.1007/s10464-007-9156-6>
- Pinderhughes, H., Davis, R., & Williams, M. (2015). *Adverse community experiences and resilience: A*

- framework for addressing and preventing community trauma*. Prevention Institute.
- Rutter, M. (1987). Psychosocial resilience and protective mechanism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57(3), 316-331. <https://doi.org/10.1111/j.1939-0025.1987.tb03541.x>
- Saul, J. (2022). *Collective trauma, collective healing: Promoting community resilience in the aftermath of disaster*. Routledge.
- Somasundaram, D. (2007). Collective trauma in northern Sri Lanka: A qualitative psychosocial-ecological stud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Systems*, 1, Article 5. <https://doi.org/10.1186/1752-4458-1-5>
- Somasundaram, D. (2014). Addressing collective trauma: Conceptualisations and interventions. *Intervention: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and Psychosocial Support in Conflict Affected Areas*, 12(4), 43-60. <https://doi.org/10.1097/WTF.0000000000000068>
- Ungar, M. (2008). Putting resilience theory into action: Five principles for intervention. In L. Liebenberg & M. Ungar (Eds.), *Resilience in action* (pp. 17-36). University of Toronto.
- Ungar, M. (2011). Community resilience for youth and families: Facilitative physical and social capital in contexts of adversity.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33(9), 1742-1748. <https://doi.org/10.1016/j.childyouth.2011.04.027>
- Walsh, F. (2007). Traumatic loss and major disasters: Strengthening family and community resilience. *Family Process*, 46(2), 207-227. <https://doi.org/10.1111/j.1545-5300.2007.00205.x>
- Walsh, F., & McGoldrick, M. (2004). Loss and the family: A systemic perspective. In F. Walsh & M. McGoldrick (Eds.), *Living beyond loss: Death in the family* (pp. 3-26). Norton.
- West-Olatunji, C., & Goodman, R. D. (2011). Entering communities: Social justice oriented disaster response counseling. *The Journal of Humanistic Counseling*, 50(2), 172-182. <https://doi.org/10.1002/j.2161-1939.2011.tb00116.x>